

經濟

大中華範圍內的經濟特區、 特別行政區和臺灣*

蕭偉諾**

引言

A 大中華

1. 全球化和亞太的區域主義：大中華和新的國際政治、經濟關係：
2. 大中華概念的演變
3. 中國的開放政策
4. 國家統一政策
5. 跨國中華文化

B. 地區經濟的相互依賴：華南經濟區域的協同聯繫

1. 澳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2. 特別行政區和經濟特區
3. 特別行政區和臺灣
4. 臺灣和經濟特區

結論

* 下一期的《行政》將有本文的延續篇。

** 里斯本科技大學社會及政治科學系東方學院獎學金獲得者。

引言

本研究的範圍是經濟特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其主要目的是對華南的亞經濟區進行識別和描述，並就它對大中華概念的定型作出的貢獻進行分析。

這一題目的選擇與關於這個在20世紀90年代尤為顯著的過程的文獻稀少有關。與此同時，其起源因素的多樣性亦引發了學人研究這個多方面現實的興趣。這一現實一般以大中華的概念詮釋。

本文章對大中華概念的起源及它在不受北京控制或管理的中國地區及華人社區在政治、經濟方面的接近進行分析。然後，對此過程所接受的有利國際環境及上述在大中華範疇內的這一亞地區的現實存在的政治、文化、經濟基礎進行描述。最後，將對華南的亞地區不同成分之間的相互依賴和協同進行分析。不同成分的存在足以有必要對它們進行識別和描述。

然而，似乎首先有必要對導致中國領土遭受肢解的某些重大事件，特別是19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和20世紀前半葉所發生的事件作一簡要的歷史回顧。

的確，除了明朝的海外征討外，在其悠久的歷史上，中華帝國幾乎僅僅關注它的陸地邊界。然而，19世紀中，她被迫來嚴肅考慮來自海洋的對其疆界安全的危險。她作出了反應，但為時已晚。

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利用它們在鴉片戰爭中所顯示的科技優勢，通過所謂的不平等條約佔領了中國沿海數量可觀和具有戰略意義的部分。它們大部分位於大江河的三角洲。

因此，英國根據1842年《南京條約》獲得了香港島，1862年又增加了九龍半島。1898年，通過一為期99年的租約，得到了新界。俄國佔領了滿州和蒙古。而日本，通過甲午戰爭於1894年佔領了朝鮮半島和臺灣島。在此情況下，葡萄牙於1887年12月1日簽署了《中葡友好通商條約》，重申了1887年3月26日的《葡京草約》。根據這一草約（第二款），“定准由中國准允，葡國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國治理他處無異。”¹

1. 何思靈 (Celina Veiga de Oliveira), 《澳門歷史地位之演變》, 《行政雜誌》, 19 / 20期, 1993年, 4月, 第6卷, 第15頁。

上述領土實際上脫離了中國的主權，中華民國及以後的共產黨中國沒有掩飾想看到它們回歸祖國的願望，以此挽回失去的面子。20世紀末，北京仍然期待重新擁有香港和澳門。香港和澳門已經成為向中國內地輸送財富和知識的平臺。尤其是在密切確定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特別是與歐共體和美國的關係時更為重要。在此情況下，嚴格執行《中英聯合聲明》及《中葡聯合聲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關係，尤其是在政治及經濟方面具有極大的重要性。

從這一角度來看，臺灣的回歸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事實上，至於這個問題，臺北政府不斷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提出的統一條件的壓力（在中華民國看來是聯合）。這種壓力在香港與澳門回歸後越發加大。上述地區已經在原來為將國民黨臺灣島收回得到國際承認而制定的一國兩制的原則下得到了統一。在此原則下，香港和澳門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方式的主要內容得到了保存，保證上述地區享有高度的自治。

在開放政策的格局中，經濟特區為香港、澳門和臺灣及中國大陸經濟結構之間相互依賴的增長作出了貢獻。對此將進行詳細的分析。甚至在政治的範疇內，許多人認為，上述區域的不同一般的經濟發展可被視為香港、澳門及將來臺灣統一過程中安定和令人擁有信心的因素。

與此同時，華人社團再次接近。這些社團來自沿海的省份——廣東和福建。幾個世紀以來，它們通過地球上最浩瀚的南海，在整個東南亞建立了華人社區，然後分佈在西方世界。目前，中國僑民在1978年開放以後的外國直接投資中的作用舉足輕重，促進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由於血緣關係和對故土的熱愛，中國僑民充滿熱情地參加了中國大陸經濟的改革和逐漸開放。改革和逐漸開放提供了一個有利的投資環境和為他們的國家發展作出貢獻的機會。海外中國僑民的進取精神和投入也是東南亞經濟蓬勃發展的決定因素。許多人認為，沒有中國僑民，“奇跡”不過是經濟擴張。本文將不斷涉及中國僑民在華南亞地區經濟關係深化中所作出的貢獻。

因此，無論臺灣，還是中國僑民是一個企圖更新、渴望獲得世界影響、獲得仍存留於帝國記憶中的影響的政治經濟結構的重要部分。

因此，本文不揣簡陋，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個經濟特區，新生的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臺灣和中國僑民在大中華範疇內的多元政治結構和一體經濟基礎的地緣文化空間的緊密連接作出客觀的分析。

A. 大中華

1. 全球化和亞太的區域主義：大中華和新的國際政治、經濟關係

全球化可被解釋為一全球性範圍內的經濟金融因素，尤其是資本、產品和服務及政治、文化元素通過思想與文明價值的交流互換而產生的相互滲透形成的一種多面現象。

由跨國企業集團決定的資金、財富、勞動力及資訊的迅速發展，它們的一切活動基於比較優勢及最大利潤原則之上。這是全球化過程的主要特點之一。

近二十年來，可以看到，某些因素促進了這個過程。最重要的似乎是科技的驚人發展。它表現在通訊、機器人和資訊技術能力的日新月異上。這一現實要求我們承認一種新的科技模式。它創造了一個新的地理空間，特別是建立了一個電子空間的地理。在此，距離已逐漸消失。的確，科技成為了主要生產力的主要推動力，同時，競爭成為科技革新的有決定性的因素。

80年代初以來的有利國際政治環境，尤其是蘇聯的崩潰，促進了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地緣經濟的邏輯逐漸凌駕於地緣政治的因素之上。最後，作為前兩點的結果，出現了普遍的區域主義和多邊主義，自由經濟及公開競爭日益強化。

作為上述因素影響的結果，出現了財富、服務及資金市場國際一體化的深化。它反映在全世界產品出口的成倍增長上。²

然而，全球化也帶來一些嚴重的矛盾。其表現為在國際勞動分工中已加入的人口區域與未加入人口區域之間的衝突。的確，80%的世界人口仍生活在消費網的邊際。³

鑒於全球化過程的性質，目前在國際範圍內建立了一種新的局面。其主要對話者是民族國家和跨國公司。在此新的格局下，全球化的力量與區

2. Yue - man Yeung《全球化與網絡社會：亞太的都市區域性變化》，夏威夷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頁。

3. 同上，同頁。

域化的力量處於協調與矛盾之中。因而，人們對全球化－區域主義這一對立事物的觀點不一而同。可以將其視為一種矛盾關係。它既可以被視為區域主義對本地工業的一種捍衛與保護的戰略，同時也可以被認為是一種補充。地區貿易集團將成為形成一個多邊體系的必要階段。至於區域主義作為一種跨國流向的複雜網絡的概念，在某一地理區域內設立更高程度的專業化和相互依賴，市場及私有經濟人的作用是最基本的，其中包括跨國公司和區域性的企業網路。⁴

另外一個有某種關聯關係的問題是，在目前的政治體系中，民族國家的作用，及其面對一種已超出了任何一種邊界範圍的新的全球經濟現實的（無）能力。導致民族國家分化最關鍵的原因之一便是民族國家的權力並不完全與其地區吻合，因而由此產生了一系列影響政府有效行使其職能的後果。作為一種替代，某些分析家已經提出了“地區國家”⁵的概念。它以某些區域或一個國家的某些部分為中心，例如日本的東京地區，印度的班加羅爾（**Bangalore**），或以不同國家或地區相鄰的區域為中心，例如香港、澳門、臺灣，以及中國的附近沿海地區。這些假設的“地區國家”與經濟合作甚為吻合，它們經常被分析為所謂的相鄰三角發展模式。例如，經常被引用的有柔佛－新加坡－廖內（**Riau**），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華南與圖門江三角洲經濟區。^{6, 7}

分析一下華南作為一種進入一體化過程的集團出現的國際政治環境的潛在因素。從蘇聯和美國之間的軍事政治競爭的國際邏輯分解後，它的發展速度加快了。取代這一地緣政治邏輯，又產生了所謂的地緣經濟主導。這一傾向隨著國家與其他國際生活代理人－尤其是企業和跨國銀行之間的競爭而突出。因此，華南的這一區域不可不同冷戰以後期間所出現的新的時空特殊性發生關係。從結構上來說，這個新的時代以蘇聯集團的解體，

4. 卡米勒爾（**Joseph A. Camilleri**）《亞太的區域主義與全球主義：經濟、安全和政治的相互作用》，**La Trobe** 大學，墨爾本，參見 http://www.toda.org/conferences/hugg_hon/hugg_hon_papers/j_camilleri.html。

5. 哈梅（**Ohmae, Kenichi**）《囊擴性的全球經濟：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的意義》，劍橋，馬薩諸塞，哈佛貿易雜誌叢書，1997年。

6. **Yue-man Yeung**《全球化與網絡社會：亞太的都市區域性變化》，夏威夷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46頁。

7. 其中的一些三角洲經濟區已於圖一內劃分。

以像德國、日本這樣的經濟強國的持續發展為其標誌。在這個世界裏，雙極已為單極所代替，而大國又在爭奪單極。在此情況下，日本、中國這樣的國家的重要性與日俱增。⁸

2. 大中華概念的演變

除了國際經濟政治的有利環境外，大中華概念具有政治、歷史及文化根源。它敘述了為何有一種經濟協同，具有中華文化及正處於政治接近過程地區的存在。

大中華概念經過一番演變及學術上的成熟之後，它已經確定了一個地理文化區域。它的政治結構是不同的，但是它具有相同的一體化經濟基礎。因此，可以假設這是“一種經濟利益及歷史文化因素的交匯”⁹。這一說法是指中國大陸同其他受到中華文化影響地區的銜接：1997年誕生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於1999年12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仍然被視作中國的一個省的臺灣，以及分佈在世界各地的中國僑民。¹⁰

作為一種經濟一體化的空間，大中華這個詞在1992至1993年間，取得了更大的穩定性。這些年裏舉行了許多研討會。第一次是在香港¹¹舉行的。它的目的是討論這一概念的意義及其後果。在此研討會上，廣泛地討論了“大中華”的使用問題，以及用它來準確描寫這一現象的有效性和適用性。但也承認與日俱增的互動性與互相依賴性確實存在，這是華人世界的構成部分。的確，在政治和戰略的舞臺上，“大”這個詞很容易獲得貶義。它與那些擴張國家通過對被政治疆界分離的同一種族的人來進行暴力行為的解釋有關。歷史遺留下來的例子有：“大塞爾維亞”及“大德國”。這兩種政治導致產生了兩次世界性的衝突。然而，人們一致認為，如果將

8. 庫科 (Ian G. Cook)，多爾 (Marcus A. Doel) 及李 (Rex Li) 《被分割的亞洲：亞太的區域性一體化與國家的解體》，太平洋興起研究系列，Ashgate出版社，第53頁。

9. 羅馬那 (Romana, Heitor)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文化因素的幾個問題》載《社會科學》雜誌單行本，1989年，社會及政治科學系1995年，第39頁。

10. 2500百萬來自廣東和福建省僑民的投資額佔在中國大陸總投資的80%，參見科里斯蒂那·阿爾維斯 (Cristina Alves) 《珠江三角洲的地緣政治與地理連貫》載《珠江三角洲中的澳門》，東方學院，社會及政治科學系，里斯本科技大學，2000年，第73頁。

11. 王 (C. F. Wang, James) 《當代中國政治：介紹》，1997年，第6版，第8章：《大華南，香港和澳門及珠江三角洲的轉向》，第189-190頁。

“大”作為“較大”的意思來解釋，那就比較合適¹²。它的含義是一個超越了行政邊界的、連貫的經濟及文化區域。

無論如何，這一概念的現代含義¹³產生於20世紀70年代末。用它來總括連接臺灣、香港及中國大陸之間的經濟關係，尤其將香港作為主要貿易中心。目前這一概念在國際研究中心及跨國公司中廣泛使用，日益進入國際關係詞彙中。¹⁴

跨國中華經濟的出現已經得到了固定。它是一種自然經濟區。它由超越國界的經濟體系構成，因此，如果有關各國政府採取扶持的態度，它的發展勢在必行。因此，儘管大家的目的是不同的，各主要華人社會的政府正在致力於深化它們經濟之間的貿易關係。從北京的觀點來說，經濟互動增加了政治統一的可能性。由於這個原因，它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促進同香港、澳門及臺灣的貿易關係。在此範疇內，應該特別指出的是，經濟特區的成立影響至大。它具有政治、貿易的目的。香港與澳門獲得了特別行政區的新地位。它們努力適應情況，以期在該地區獲得新的比較優勢。而臺灣則相信，經濟互動的深化可能導致北京方面的政治讓步。

許多參加香港會議的人認為，如果政治障礙得到克服，中國統一在一個主權之下，大中華也許會獲得超級大國的地位。的確，儘管政治統一的正式障礙依然存在，但非正式的經濟一體化接觸已經迅速發展。同時，從經濟和文化角度來看，民族國家與政治單位的重要性越來越小：人員、思想、財產、投資已經超過任何一個區域或政治的邊界，對居住地區的政策視而不見。

12. 對許多亞洲人來說，“大中華”這個詞令人回憶起日本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製造“大東亞洲共榮圈”的策略目標。參見桑巴格(David Shambaugh)編，《中國季刊》，1993年12月第136期，第655頁。

13. 在帝國時期，常常區別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省份(18個漢人省份)及藩屬。這是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它們向中國稱臣。在必要的情況下，以武力保證這種隸屬關係(清朝時，這些地區包括滿州、蒙古、新疆和西藏)。這些疆土總合起來形成中華帝國。在20世紀30及40年代，西方常以“大中國”來稱呼這一系列疆土，因為中華民國未能有效地控制在其所有疆土之內的藩屬。參見桑巴格(David Shambaugh)《引言：大中華的誕生》，《中國季刊》，1993年12月第136期，第662頁。

14. 參見桑巴格(David Shambaugh)《引言：大中華的誕生》，《中國季刊》，1993年12月第136期，第664頁。

為了正確瞭解這一過程的實際規模，從分析的角度來說，必須對經濟、政治及文化方面加以區分。有不同的邊界及不同的行業中心。

大中華集團的形成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推行的兩種政策有直接關係。第一種是對外開放政策。它使中國當局有可能通過直接的外國投資來促進地區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廣東、福建和海南，以及與澳門、香港及臺灣靠近的邊緣地區。第二種是國家統一政策，其基礎為“一國兩制”。一開始它是為解決具有獨立傾向的臺灣省而設計的。現在它保障在最近成立的特別行政區內保留原有生活方式的主體。從另一方面來講，“一國兩制”這一原則促進在上述沿海地區採取市場經濟的機制，對外國投資開放。

3. 中國的開放政策

對外開放政策形成於1978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進行經濟改革的決議。這是一項權力下放的戰略，發展中國沿海各省，尤其是廣東與福建。這些省份傳統上來說，比較容易受到外部的影響。因此，在同中央政府進行談判後，一些措施逐漸得到了引進。這些措施包括建立四個經濟特區，其中三個位於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一個位於福建（廈門）。上述省份的政府獲得了廣泛的立法及行政權力，來管理這四個經濟特區。

在此情況下，由省一級任命的行政官員管理的經濟特區促進發展深圳－香港，珠海－澳門，廈門－臺灣之間的經濟關係，以及吸引中國僑民來汕頭進行投資。同時，這些“視窗”提供了吸收外國投資、先進科技、專門技術人員及新管理技術的入口。1988年4月宣佈了海南島將開闢為最大的經濟特區，給它一個獨立省份的新地位。因此，通過設立這些經濟特區來推行一種權力下放的政策，形成一種已成型的“國際化的區域主義”。¹⁵

從設立最早的經濟特區開始，為沿海地區的發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戰略。1984年至1986年間¹⁶，宣佈14個城市對外國直接投資開放。而後的

15. 科索樂 (Narana Coissoro)《珠江三角洲中的澳門》，東方學院，社會及政治科學系，里斯本科技大學，2000年，第14頁。

16. 1984年至1986年，國務院宣佈14個沿海城市對外開放，稱科技經濟發展區（ZDET）。許多經濟特區的稅收鼓勵擴展到這些沿海城市。1990年，它們佔國家總出口的58.1%。1992年已經有32個科技經濟發展區。它們是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雲港，南通，寧波，福州，廣州，湛江，閔行，虹橋，漕河涇，溫州，昆山，營口，威海，融僑，東山，沈陽，哈爾濱，長春，杭州，武漢，重慶和蕪湖。

幾年中，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及漳州、泉州地區¹⁷也宣佈開放。在此情況下，上海東部相對來講“不甚發達”的浦東也於1990年初對外開放。它獲得了與經濟特區相同的優惠。這一新的開發區鼓勵外國在商業、金融方面進行投資。在這些經濟特區中，珠江三角洲成為一個經濟迅速發展的極地。

華南地區是中國經濟政策的前沿，因此，它與東南亞的經濟緊密相連。所以，福建省70%的投資都來自於臺灣。香港－廣東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甚至出現了一個人員和資金自由流通的區域。在中國的北部，南朝鮮在山東投資。在南部，雲南與泰國和婆羅洲之間有聯繫。在這些不同區域內，外國投資享有不同的優惠政策。例如，經濟特區所得稅是15%，其他開放地區的所得稅則是24%。總而言之，中國的改革開放計劃保證廣東省及福建省享受專門優惠。這些省份可以留存出口收入的70%。出口已超過1978年的水準（也就是說，14億美元）。¹⁸

另一方面來講，由於地區及國際競爭的因素，在廣東及附近新興工業中來自香港、澳門及臺灣的投資迅速提高。的確，主要的貿易伙伴，如美國、歐盟及日本的保護政策及由於房租、工資上漲帶來的生產成本的上昇而失去競爭力，使得生產廠家必須遷址。因此，按照珠江三角洲發展區的例子，設立了廣闊的為密集型工業服務的生產區。

這一實際華人經濟區的發展基因始於中國的改革開放與臺灣的經濟自由化。另一方面，形成了中國吸引外資及承認外國技術的經濟政策。它的表現形式便是在有可能獲得資金的香港，尤其是臺灣的附近省份設立經濟特區。上述地區的投資者非常高興看到他們的那些成本已經不相適應的工廠遷到勞動力比較便宜的地區去，而這些地區在地理及文化上又與他們比較相近，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傳統的計劃經濟有所區別。

另一方面，與香港相反是，臺灣當局在80年代初認為，臺灣和大陸之間的貿易發展弊大於利。然而巨大的中國市場的對外開放，越來越吸引了

17. 這地區位於福建省，與廈門經濟特區北部緊連。

18. 庫科 (Ian G. Cook)，多爾 (Marcus A. Doel) 及李 (Rex Li) 《被分割的亞洲：亞太的區域性一體化與國家的解體》，太平洋興起研究系列，Ashgate出版社，第61頁。

位於臺灣的企業，尤其是新臺幣受歡迎，中國大陸低下的工資與臺灣日益增長的生產成本形成比較，以及可以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配額的機會。企業家不斷呼籲政府，要求他們停止對貿易的限制，而且表達了他們對來自日本及南韓的競爭的擔憂。在事實面前，臺灣政府終於做出了讓步，允許直接的接觸。這反映在1987年12月的決定中。這一決定允許臺灣人去大陸探訪家人。這一人員流通的便利為海峽兩岸的經濟發展帶來了一個高潮。1988年，中國國務院發表了二十四條措施，鼓勵臺灣投資。作為這些措施的結果，近五百萬臺灣人訪問了中國，近萬中小企業將他們密集勞動型的廠家遷往中國大陸。1987至1993年的總投資額達到了110億美元。

儘管仍在形成中的一體化有多種因素，阻礙這一中國經濟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障礙不是不存在的。這些障礙包括中國的中央計劃經濟以及臺灣及中國大陸企業間的直接接觸仍然受到禁止。然而，地理及文化上的接近，這種經濟互補帶來的巨大利潤遠遠超出了為經濟互動設立的障礙。

事實證明，臺灣、香港、廣東及福建之間相互推動的經濟已成為目前世界上第四最強大的經濟實體。1978年至1997年中，每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為11%。¹⁹而從他們並不總是消極的經濟活動中出現了相應的政治反應。例如，在福建省，具體說是在廈門經濟特區，臺灣資本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為在海峽兩岸政治階層之間設立所謂的“保密樓措施”²⁰作出了貢獻。這是經濟一體化－政治統一的明證。

4. 國家統一政策

北京政府一直認為，國家的統一是一項歷史使命。目前的國家統一政策始於1984年以“一國兩制”方式提出。直至今日，任何兩個中國的影射仍不為共產黨領袖們所接受。“兩制”意味著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和香

19. Yanrui Wu《華南地區的生產力，成長和經濟一體化》，《亞洲經濟報刊》2000年，第14卷，第1期，第40頁。

20. 參見桑巴格（David Shambaugh）《引言：大中華的誕生》，《中國季刊》，1993年12月第136期，第657頁。

港、澳門及臺灣的資本主義。上述地區將以特別行政區的形式併入中國。因此，它們在立法權、行政權及司法權方面享有高度的自治。國家統一政策帶來了《中英聯合聲明》及《中葡聯合聲明》及為香港及澳門過渡過程制定的相應的《基本法》。在臺灣方面，將允許保留其政治及司法制度，經濟及社會結構，自治的武裝力量和獨立的經濟、文化對外關係。同北京的關係將通過駐紮中央政府的一個辦事處來協調。1993年8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的題目為《臺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的官方報告²¹重申了這一系列建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統一過程所採取的態度於1979年受到了實際的檢討。那時，“解放臺灣”的口號已為“和平談判”的政策所取代，開展分階段的接觸。作為第一步，必須使海峽兩岸人民的接觸更加流暢。這便反映在“三通政策”上（包括通商、通郵及通航）和“四交流”（學術、文化、體育及科技）上。作為回覆，臺灣拒絕同中國共產黨有任何承諾、談判，甚至接觸。還發表了一些分析家稱為：“三不”²²的政策。因此，臺灣政府僅僅允許通過中間人發生貿易關係。香港起到了這個作用。第二個階段，80年代末，中華人民共和國施加壓力，要求就統一進行談判。鑒於那時取消了（施行了38年的）戒嚴法，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的優秀繼承人，他的兒子蔣經國宣佈人員可以自由前往中國大陸。臺灣的形勢有利於北京的企圖。

1991年，“三不”政策正式為“國家統一方針”所代替。這些方針提出了一些重建統一中國的條件：“在和平、平等及互惠的基礎上，經過一段合適的協商，接觸及合作後，就民主、自由、財富平均分配達成共識。”²³

當時需要成立一個輔助機構來處理統一問題（這是臺北的看法）。於是於1990年9月出現了國家統一委員會。它負責向總統府提供新的解決方案的資訊。

21. 同上，第60頁。

22. 同上，同頁。

23. 威廉 (Van Kemenade, Willem)《中國、香港、臺灣》，INC.,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6年，第112頁。

第二年年初，國民黨於1988年成立的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MATF）為大陸問題委員會（MAC）所代替。從此，它成為策劃與協調同大陸關係整體政策的基石。²⁴

因為不可能設立一更高層次的談判平臺，臺灣當局於1990年11月成立了一個非政府的海峽交流基金會（SEF）。它負責與中國當局進行正常的接觸。等到1991年12月，海峽的另一側有了回音，成立了海協會（ARATS）。這一協會所負責的主要是海峽兩岸人民的旅遊、貿易、法律、文化及一般問題方面的有關談判。²⁵

第一次汪辜高峰會議在新加坡舉行，以紀念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為促進兩個對手而作出的努力。²⁶於是1993年4月，江澤民主席的私人顧問汪道涵與李登輝的親信，著名的百萬富翁辜振甫來負責這項工作。但是雙方僅在一些較小的方面達成了共識，例如證件的審核，遺失郵件的賠償。雙方重申了在將來進行正常接觸的願望。這一僵局也許是來自於臺灣對經濟問題，尤其是對在中國大陸的投資進行法律保護問題的堅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認為，在政治方面，尤其是恢復一切通航及直接貿易方面作出讓步，這一發展是無法實現的。²⁷

第二次會談的目標是北京由於李登輝總統於1995年6月訪問美國以及臺灣1996年第一次直接總統選舉前，北京進行的軍事演習而造成的關係緊張。直到1998年2月，兩個基金會的主席纔同意在上海會見，重開談局。的確，北京當局似乎已經意識到，這一兩個中國之間唯一的溝通渠道太長時間的中斷祇會影響臺灣與大陸之間本來就脆弱的經濟、文化及人員交流的紐帶。

24. 休斯(Christopher Hughes)《臺灣和中國民族主義－國家認同與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倫敦，Routledge出版社，1997年，第7677頁。

25. 科魯格(R. N. Clough)《試圖穿越臺灣海峽：民間外交》，Westview, Boulder出版社，1993年，載威廉(Van Kemenade, Willem)《中國、香港、臺灣》，INC.,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6年，第60頁。

26. 威廉(Van Kemenade, Willem)《中國、香港、臺灣》，INC.,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6年，第116頁。

27. 同上，同頁。

1998年10月，辜振甫率領的代表團，在北京同江澤民主席會見後，與汪道涵在上海開始了會談。雙方約定，汪道涵於1990年間訪臺，日期再定。

然而，這一雙方的接觸很快受阻。1999年7月，李登輝總統在一家德國電視臺對他的採訪中宣佈說，臺灣的憲政改革將確定海峽兩岸的關係模式。這一關係應該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或者至少是一種國家之間的特殊關係。北京當局的反應異常激烈。它指責李登輝總統企圖將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同時，北京立即取消了已經約定的汪道涵訪臺計劃。

中國共產黨政權當局接受至2000年3月18日的總統選舉，對李採取一種置若罔聞的態度。一月份北京已宣佈，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陳水扁是“不可接受的”，而由國民黨提出的連戰和獨立候選人宋張配祇要他們拒絕李總統提出的兩個國家的理論，將是“可以接受的”。的確，民進黨的黨章規定，成立政府以後，該黨必須就獨立問題進行民意測驗。2000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表的“白皮書”表明了北京領袖對此問題已失去耐心，它拒絕同李總統這樣的人進行談判。

2000年2月及3月初的總統競選是臺灣歷史上有史以來罕見的。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獲選。這意味著國民黨55年政府的結束。獲勝的候選人立即重申了他的競選聲明——人民的總統，而不是一個政黨的總統——。同時，他補充說，將為改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進行努力。幾天以後，陳總統向北京建議說，民進黨將取消它黨章中這個有爭議的條款。他建議說，在屬於臺灣的金門島和廈門經濟特區之間設立三種溝通方式。同時邀請汪道涵參加5月20日他的總統就職儀式。上述建議未得到北京，亦未得到民進黨中央委員會的響應。可見這位總統任期的飄搖。

2000年5月，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在對新聞界的聲明中解釋說，“一個中國並不僅僅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他還補充說，“中國的主權與領土是不可分割的，但是至於海峽兩岸的關係，雙方應平等，不應該產生一種中央—地區的關係。”²⁸

28.《世界報》，2000年5月10日第1頁。

陳總統在其就職儀式上還說，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使用武力，他的政府將承諾不宣佈獨立和改變政體，並不在中華民國的憲法中加入兩國關係的概念，不對臺灣的獨立進行公民投票，取消國家統一方針。這一態度受到了北京的熱烈歡迎。儘管不懷疑其宣言的真誠，北京堅持說，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進行的談判不可無限期地拖延下去。也就是說，北京當局接受“觀望”的態度。

陳總統從他就職以來，鑒於看來無任何一種解決方式會獲得政黨及一般民眾的一致認可，企圖保持現狀。目前，一些中國學者否定說，某種聯邦制的可能性與“一國兩制”的模式不符。但有跡象表明，這個概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得到更大的接受。鄧小平公開說，如果臺灣認為這是最可接受的想法，聯邦主義可以是中國統一的最有效策略。²⁹

5. 跨國中華文化

面對這兩種政策，出現了一個第三方面。它不是一個正式的政策。它表明，一種共同文化的影響可以決定一種相同的行為與思維。它有益於統一的進程。在此情況下，有些分析家甚至認為存在一種大中華的人民文化。它的主要基礎是香港和臺灣20至40歲這一代人，現在已經深深地打入了中國大陸年輕人的意識。³⁰這種影響顯而易見。在大陸，香港和臺灣的人民文化日益獲得更多欣賞，海峽兩岸之間的藝術家、歌唱家和作家的交流日益加強。這種傾向代表了由中國移民社團長久以來形成的一種跨國的中華文化社會的重歸。中國移民從中國出發，現在分佈於世界各地。15及16世紀的，當大量商人開始在東南亞許多港口定居時，這一移民運動蓬勃發展。稍後，在17世紀，當明朝的同情者開始向臺灣大規模移民時，這種運動也加強了。19世紀至20世紀勞動力的移民也滿足了西方工業革命的需要。即便是從1949年開始，中國已經出現了政治分裂，許多政治避難者在香港、臺灣、東南亞及北美洲獲得庇護。這一移民潮部分為向西方大學流動的大學生及學者所替代。

29. 哈爾定 (Harry Harding)《大中華的概念:題材,變化和保留》載《大中華:下個超級大國?》

桑巴格 (David Shambaugh),《中國季刊》,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30頁。

30. 參見桑巴格 (David Shambaugh)《引言:大中華的誕生》,《中國季刊》,1993年12月第136期,第659頁。

主要是意識形態的差異，不同的社團老死不相往來，它們互相認為對方是對中華民族的順利發展不利。然而，一個個家庭盼望已久的團聚，歸鄉夢，以及藝術家、知識分子和科學家與別人共享他們的著作和思想的願望是不可否定的。同樣，在一般的中國公民中也產生了想瞭解在其他不同的社會情況下以他們自己的語言所產生的文學、音樂及藝術的渴望。交通及通訊的整體發展促進了文化交流。這又大大地提高了所有的渴望和盼望。

從有關政府方面來說，他們不僅僅是這一過程的局外者。共產黨領導人認為，貿易關係以外的文化交流是促進國家統一理想的途徑。在臺灣看來，文化紐帶可以顯示生活品質的差別，因而可以加強臺灣政府的合法性。總而言之，在文化互動的宗旨下，使用同樣的語言，以及屬於一個共同文化歷史的人民的歸屬意識連接了處於不同政治及經濟環境中的中國社團。它預示著一個以某種文化相同點為基礎的超級大國的出現。

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些自從鄧小平提倡的經濟開放以來的文化交流促進了實際的經濟紐帶。它以極有誘惑力的外國投資政策為基礎。它形成一種超越國家的中華經濟。它是區域性經濟互補的後果。

承認這種經濟一體化的過程帶來了很好的政治發展。也許它可以導致政治統一。

B. 地區經濟的相互依賴：華南經濟區域的協同聯繫

20世紀80年代中期，某些經濟分析家設計了華南地區、香港、澳門及臺灣之間經濟合作的初步設想。這是一個後來被羅博特·斯卡拉皮諾（Robert Scalapino）這位專家稱之為華南自然經濟區的亞地區。³¹ 華南這一地區日益加強的華人地區的經濟一體化是比較優越性的基礎：廣東、福建、海南土地使用及勞動力價格便宜；有位於香港的交通及國際金融中心；來自臺灣的資金、技術和企業經驗。³²

31. 《太平洋興起報告》，第5期，1997年7月，舊金山大學（烏勒（Stephen Uhalley Jr）《香港和大中華》，舊金山大學，參見<http://www.pacificrim.usfca.edu/research/pacrimreport/pacrimreport5.html>。

32. Xiangming Chen《中國的綜合增長與亞太的經濟》，載《這是在外緣？：對太平洋地區想法的評論透視》，蒂爾利科（Arif Dirlik）編，1997年，第195頁。

香港城是這個亞地區中貿易及工業活動的主導元件。自從1970年末建立經濟特區以來，香港在中國、區域及全球經濟之間起到了中間人的作用。整個20世紀80年代，香港和中國之間的貿易成倍增長。通過香港的中國出口和進口的間接貿易是1980至1987年間直接貿易的五倍。1980年，廣東省50%的貿易是通過香港進行的。其中有96%是受國家企業控制的。1993年，增長了13%，國際貿易額的85%，也就是說，一共達到了350億美元的額度。這都是通過香港和澳門進行的。受中國中央政府或者省一級政府控制的貿易企業的百分比則降到了37%。³³ 如果香港不為大陸和臺灣之間財富的流向進行中介，中國和臺灣之間的貿易不會發展如此之快。從1988年上半年香港進口到中國的45億美元的產品來看，20%是在臺灣生產製造的。這一百分比僅僅低於從日本進口的數量。

這是一個活生生的現實。通過各方面強有力的貿易紐帶得到了加強。華南經濟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居住在東盟國家，尤其是新加坡的中國社團的直接投資。

與對外貿易相比，直接的外匯投資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工具。它促進了中國南方各省，香港、澳門及臺灣之間的一體化。1985至1991年間外國直接投資數量最大的省份是廣東省、福建省及海南省。³⁴ 它們分別佔第一，第二和第八位。廣東省70%的資本來自香港，在福建省則是佔60%。某些分析家估計，臺灣在中國投資的三分之一位於福建。在此情況下，香港、澳門及臺灣在與於其鄰近的省份廣東與福建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經濟特區。³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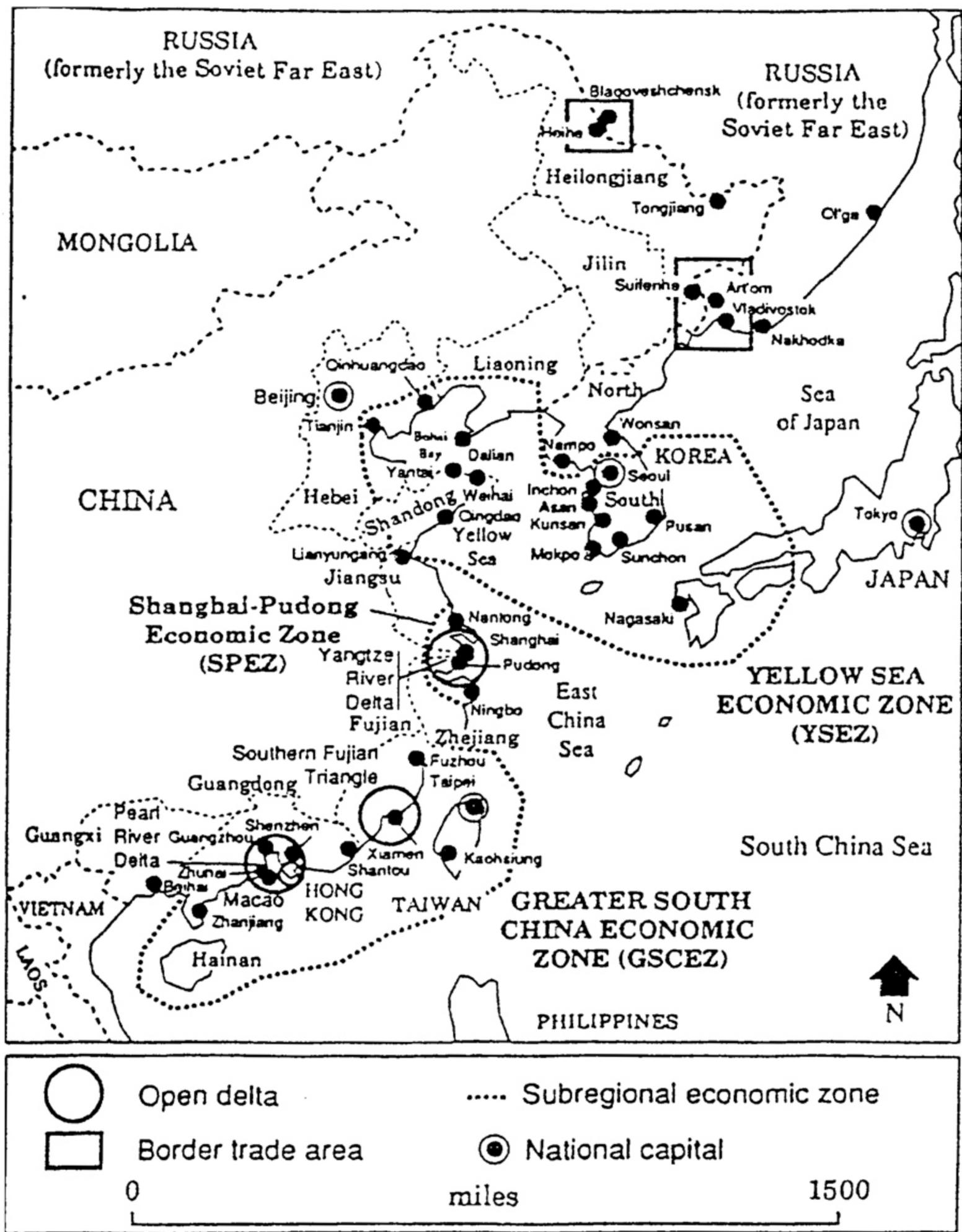
上述中國大陸的省份以廣東省為主。它是中國主要的出口地區。1994年，佔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總額的44%，製成品的40%及外國投資企業出口的65%。³⁶

33. 諾爾 (Tracy Noel) 《東南部：中國區域經濟中中國經濟改革的先鋒：奔向2020年？》，林格 (Godfrey Linge) 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牛津、紐約，1997年，第76頁。

34. Xiangming Chen 《中國的綜合增長與亞太的經濟》，載《這是在外緣？：對太平洋地區想法的評論透視》，蒂爾利科 (Arif Dirlik) 編，1997年，第197頁。

35. 阿什 (F. Ash, Robert)，奎 (. Y. Y. Kueh) 《大中華之內的經濟一體化：中國，香港及臺灣之間貿易和投資流動》載《大中華：下個超級大國？》，桑巴格 (David Shambaugh) 編，《中國季刊》，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90頁。

36. 諾爾 (Tracy, Noel) 《東南部：中國區域經濟中中國經濟改革的先鋒：奔向2020年》，林格 (Godfrey Linge) 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牛津、紐約，1997年，第77頁。



圖一，華南經濟區。

自料來源：Xiangming Chen《中國的綜合增長與亞太的經濟》，載《這是在外緣？：對太平洋地區想法的評論透視》；蒂爾利科（Arif Dirlik）編，1997年，第196頁。

1. 澳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上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香港與澳門之間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更加蓬勃的階段，其主要表現形式是香港加強了在這一葡萄牙管理下的飛地的貿易及投資。在此期間，來自香港的資金流向覆蓋了澳門經濟的許多方面。“香港因素”是澳門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發展的最主要推進力。³⁷

在此情況下，香港與澳門之間的貿易是澳門傳統貿易總體的一個重要方面。目前，香港仍然是澳門出口業最大的投資者。出口業在很大程度上來講，是香港生產活動的延續。然而，在1997至1999年之間，澳門向香港的出口和從香港的進口有明顯的減緩。的確，1997年澳門從香港的進口高達522百萬美元，而這一總值降低了25%，一共為367.7百萬美元。澳門向香港的出口在同年為149.2百萬美元，比1997年減少8.2%。³⁸ 然而，香港仍然是中國大陸以外，澳門的第二大進口來源。同時又是美國和德國以外的澳門產品的第三大出口地。

澳門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強調了加強它們之間實際合作關係的必要性。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其第三次年度施政報告中，呼籲加強廣州、香港、澳門、深圳及珠海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目的是達到資金、勞動力、財產及服務的自由流通，以適應更高一級的經濟發展需要。³⁹

比較而言，澳門的經濟規模較小，但是具有很強的能力：許多世紀以來不同文化共存形成的遺產造成的旅遊資源；反映在博彩工業的興旺上的娛樂旅遊的高度發展；稅收及製造成本比香港為低；在珠江西面發展區中具有地區發展中心的潛力；它是臺北和北京之間貿易及投資關係可能的促進者；通過它的歷史淵源，可以同葡語國家及拉丁文化的國家，以及與歐盟進行國際聯繫。從香港來說，它是一個國際性的貿易、金融中心。同時，它可以促進保持中國大陸和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密切貿易關係。

37. 《澳門聚焦》，在新世紀中澳門與中國大陸及香港的經濟和財政合作，第1卷，第2期，澳門國際研究所，2000年7月，第35頁。

38.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http://www.ipim.gov.mo/pageen/main/info/infT5.htm>。

39. 香港貿易發展局，<http://www.tdctrade.com/econforum/boc/000101.htm>。

在“兩制”的精髓——特別行政區之間應該尋找共同的問題，以尋求共同的解決方法。就此意義而言，某些當地人士提出成立香港、澳門、深圳及珠海之間進行合作的機構。⁴⁰

在此情況下，在分析共同的問題時，必須看到如下事實：上述兩個特別行政區自從中國大陸對所有外國投資給予“全國性”政策的優惠以後，有所損失。澳門的損失大於香港，因為香港有許多跨國公司。從另一方面來講，至於特別行政區之間的經濟及貿易關係，香港在澳門的工業投資速度明顯放緩。雙邊貿易有所下降，而且兩地的金融業方面的協調仍需要進一步加強。

2. 特別行政區和經濟特區

除了澳門及香港之外，華南的一系列城市也具有了吸收外國投資、傳送財富及經濟影響中心的功能，尤其是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經濟特區。⁴¹

根據中銀集團制定的一份關於特別行政區和中國大陸之間的經濟及金融合作的報告，通過經濟金融部門的改革，上述經濟可得到更大的推進，深化經濟一體化。從此意義而言，正在準備進行的成千上萬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將使許多總部設在香港和澳門的公司可以參加許多位於華南“自然”經濟區企業的資本。⁴²

為了有效地完成改革，必不可缺的是採取根據國際標準完善與更新的立法。從此意義而言，在立法方面，為經濟特區提供了很大的自主權，以便為保障最佳投資條件及適應每個經濟特區的本身經濟優勢設立法律框架。關於這個問題，請注意珠海黨委書記梁廣大在香港回歸前夕對《華南早報》所作聲明中的一番話：“我認為，經濟特區的立法權對於發展是積極的，因為它的前途是遠大的，為憲法改革提供了教益。中國需要為新立

40. 以何玉棠為例。他是在全國政協有一席之位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人士，參見《澳門論壇報》，2001年3月13日。

41. 廣東省省會廣州，福建省省會福州所起到的作用是同樣重要的。

42. 《澳門聚焦》，在新世紀中澳門與中國大陸及香港的經濟和財政合作，第1卷，第2期，澳門國際研究所，2000年7月，第37頁。

法進行摸索。”⁴³顯而易見，經濟特區將保持它的特性。不再那樣一味追求吸收外資的特殊政策，越來越堅持進行以法律為基礎的對所有的經濟及社會結構的現代化。因此經濟特區不僅僅對於經濟特區，而且對於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制度的更新都將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作為羅馬日耳曼模式的主要支柱，中國法律體系傾向於深深地受大陸法及歐洲法模式的影響。基此，在使法律合符國際標準及現代化方面，中國法律體系出現深層的改革。原於葡國及羅馬日耳曼模式的澳門法律體系對中國法律的改革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作為香港、廣東省及整個華南經濟區貿易關係的深化，各個特區都努力改善當地的交通基礎設施。20世紀80年代初啟用的連接香港及廣州的鐵路成為了二者之間最重要的交通樞紐，興建了一系列的基礎設施，尤其是公路、橋樑及客運碼頭，以改善整個珠江三角洲沿岸的水陸交通。這些設施是連接各個特別行政區與經濟特區一體化設施的部分。因此，汕頭特區已經通過一條高速公路與深圳及香港連接。它們之間旅行的時間僅僅四個鐘頭。正在研究興建一座將澳門、珠海同香港、深圳連接起來的長達近43公里的橋樑。它將穿越整個珠江三角洲。同時也在研究將連接珠海和廣州的高速公路及鐵路延長到澳門。它的長度是185公里。這一客貨兩用的鐵路線將連接澳門，尤其是將路氹填地和九澳碼頭通過斗門市同高瀾深水港連接。在此情況下，廣東省將改善並擴展它的鐵路系統，向西發展，支援海南經濟特區的發展。

至於香港、澳門同深圳、珠海的關係，這些地區現在已經進入了珠江三角洲地緣經濟空間。⁴⁴1979至1985年間，深圳經濟特區所吸收的88%的資金來自於香港和澳門。1990年，深圳經濟特區佔中國外匯投資的七分之一。

43. 參見<http://www.hongkong97.comhk/newera/life/qualityoflife/Article1997.html>。

44. 在珠江三角洲的地理區域裏，有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和1985年建立的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發展區。發展區由6個城市（廣州，佛山，江門，中山，肇慶和惠州），28個縣和珠海、深圳兩經濟特區組成。它涵蓋了廣東省26%的面積。珠江三角洲發展區的起源是澳門、珠海、香港-深圳之間經濟關係的發展，以及省城廣州對這些發展基地所具有的策略重要性。參見科里斯蒂那·阿爾維斯（Cristina Alves）《珠江三角洲的地緣政治與地理連貫》載《珠江三角洲中的澳門》，東方學院，社會及政治科學系，里斯本科技大學，2000年，第69頁。

同時出現一個並行的情況：香港經濟在重視第三產業的同時，大規模地將工業單位遷往廣東省。目前，將近有五萬香港居民每天前往廣東省。大部分人是遷移工廠的管理人員。在這情況下，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在深圳購置了居所。深圳每平方米的價格僅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價格的三分之一。⁴⁵因此，深圳將重現香港的發展。借助香港的大量投資，初為工業生產中心，而後再重點發展第三產業。

1997年，深圳特別經濟區75%的外匯投資來自香港。主要是投資用於電子產品及資訊技術產品，以及建材與機器製造。近幾年來，香港投資者已經進行多方面的投資。他們的目標已經轉向第三產業，包括不動產，旅遊及娛樂業。⁴⁶

珠海特區的人口是1.15百萬。1996年的出口為289百萬美元，比前一年增加16.5%。該年，外國投資佔總投資60%。近一半的外國投資來自於香港。⁴⁷

至於澳門特別行政區，這一地區從1999年12月20日回歸之後，獲得了新的發展機會。在經濟上，較之香港具有更大的依賴性。澳門取決於區域經濟紐帶的穩定來振興1993至1999年之間曾出現的0.2%的經濟負增長。因此，澳門可以發展它的最重要的工業—旅遊業，此來確定它在珠江三角洲流域地區，以及在整個華南經濟區的比較優勢。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珠海經濟特區之間的合作在2000年中有了新的進展。的確，該年一月份已經可以向中央政府提交這兩個鄰近地區之間合作的具體計劃，例如建立一個加工發展區（高瀾保稅加工區），以及共同發展大橫琴島的旅遊。大橫琴島已經通過蓮花大橋同路氹填地連接。⁴⁸

2月初，澳門特別行政區接待了廣東省的一個正式代表團。廣東省省長稱讚說，這是“兄弟情意”精神的友誼。除了促進廣東，尤其是珠海經濟特區及澳門之間的貿易和經濟合作關係之外，宣佈成立一技術小組來跟進

45. 蒙得哈 (Reuben Mondejar)《未來於今始。1997年的香港與中國》，香港理工大學，參見<http://www.usis.usemb.se/ERT/e06/9HONGKO.HTML>。

46. 香港貿發局，參見www.tdctrade.com。

47. 全球在線資源，貿易及旅行中心，參見<http://www.globalsources.com>。

48.《今日澳門》，2001年1月22日。

合作計劃的實施。根據官方數字，2000年中，澳門經濟特區與廣東之間的貿易額達到了660.3百萬美元，比前一年增加9.2%。⁴⁹

在其他經濟特區，如汕頭、廈門和海南，它的投資及貿易額也是同樣可觀的。至於汕頭，1997年投資的80%是通過香港進行的，總額達到460億美元。同樣這一特區的外貿的80%也是通過香港進行的。

同樣，澳門特別行政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也加強了同福建的合作關係。廈門經濟特區便位於福建。在此情況下，澳門特別行政區首長和當時的香港財政司司長曾蔭權於2000年9月應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的邀請，參加了在廈門舉行的貿易投資展覽會。當時制定了一個澳門特別行政區和福建省雙邊經濟合作的計劃。⁵⁰至於特別行政區在海南的投資，1993年，香港及澳門在這個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投資的總額達到2,379百萬美元，佔該地區總投資的80%。

3. 特別行政區和臺灣

至於臺灣同新近成立的香港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臺灣表示有意看到在上述兩個地區保持自由、民主、穩定及繁榮。的確，1997年3月18日，臺灣的有關立法當局發表一項官方文件——《港澳關係條例》，它規定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基線。這一聲明是臺灣同上述地區關係的許多方面，例如互設負責經濟及文化接觸、交通及財產、貨物及人員的流通的代表處的法律框架。上述聲明還包括向香港和澳門居民發放工作證和移民准許的可能性。⁵¹

香港特別行政區與臺灣的經濟、貿易關係，從很大程度上來講，是通過香港向中國大陸再出口來自臺灣的貨物並再從中國向臺灣出口貨物。的確，1999年，臺灣和中國之間間接貿易佔香港貿易的6%及轉口貨物的13%。因此，中國與臺灣之間間接貿易額為810億美元，較1998年減少2.2%。大陸與臺灣之間間接貿易額約為160億美元，較前年減少

49. 《今日澳門》，2001年2月8日。

50. 《人民日報》英語電子版，參見<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200012/22.html>。

51. 參見<http://www.taipei.org/info/99roc/unification.htm>。

1.6%。據中華民國財政部的數字，該年香港向臺灣的出口達到210億美元，從臺灣進口的額達到260億美元。⁵² 臺灣在香港的投資總額有了明顯的回昇，從68.6萬美元到103百萬美元。而香港在臺灣的投資則呈相反的趨勢，從1998年的274.5百萬美元減少到1999年的161百萬美元。

1999年初，將近92萬臺灣人在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途中訪問了香港。同年，香港居民訪問臺灣島的人數達到226,450人次。⁵³

至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與臺灣的經濟貿易關係，可以看到，雙方的經濟關係有了顯著的增長。因此，臺灣與澳門之間的貿易額從1992年的97百萬美元上昇到1998年的360百萬美金。在此數額中，319百萬美金是臺灣向澳門的出口，其餘的41百萬美金是臺灣從澳門的進口。1999年中，總的貿易額有所下降，降至321百萬美元，但是澳門向臺灣的出口有所增加，從上述41百萬美元上昇47.8百萬美元⁵⁴，臺灣是澳門的第四大貿易伙伴。⁵⁵ 澳門有數家臺灣企業，其中包括長榮航空、泛亞航空及臺北國際商業銀行。同時，澳門也為與其相鄰的中國其他地區帶來了臺灣投資。在珠海特區約有320家臺灣公司和工廠在運作。

1995年，澳門與臺灣設立了航線，為臺灣遊客提供了便利條件。所以，從臺灣來的遊客可以在澳門免簽逗留二十天，而在香港必須辦理這一手續。1999年，將近九十萬臺灣旅客利用澳門國際機場進出中國大陸。實際上，澳門本地的航空公司－澳門航空公司70%的收入來自臺灣市場。臺灣與中國之間的航班僅在澳門作一簡短的停留，試圖繞過二地對直接通航的禁止。

至於文化交流，據大陸委員會制定的一份關於臺灣與澳門關係的報告，因求學與尋職前往臺灣的澳門人數達到了31,330人，其中756人已經獲得合法居留。另據同一報告，2000年中，澳門接待了1,027百萬臺灣遊客。⁵⁶

52. 大陸委員會，參見<http://www.mac.gov.tw/english/CSExchan/890124/table1.gif>。

53. 大陸委員會，<http://www.mac.gov.tw/english/CSExchan/890124/table8.gif>。

54. 大陸委員會參見，<http://www.mac.gov.tw/english/CSExchan/890124/table8.gif>。

55. 參見<http://www.taipei.org/whatsnew/macau-1227-e.html>。

56. 《澳門論壇報》，2001年3月15日。

同一報告還指出，“儘管臺灣與澳門之間的非正式關係正在逐步建立，雙方之間經常的直接關係渠道是可取的。此種直接關係有待建立。”近期，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鏞在對本地一家報紙的聲明中說，可以考慮在適當的時候在臺北開設負責處理經濟、貿易、旅遊及文化方面事務雙邊問題的代表處。設立在澳門的臺灣經濟文化中心具有上述官方功能。它的負責人是蔡之中。⁵⁷

澳門經濟特區在解決臺灣及中國統一的問題中可以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在此情況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聲明說，儘管“澳門作為中介人的功能將受到影響”，“考慮到雙方和平統一給國家帶來的好處，應該建立中國與臺灣之間的直接關係”。因此，“必須研究最大程度地降低負面效應的方法”。他認為，“直接關係的建立也意味著澳門將有更多的貿易及發展機會。”⁵⁸

4. 臺灣和經濟特區

廈門經濟特區在地理及文化上來說，與臺灣相近。1991年，它得到了海峽對岸的大規模投資。臺灣投資在它所吸收的投資中佔42%。在廈門的第八個五年計劃（1991年至1995年）中，至1995年，廈門經濟特區國民生產總值的55%是由臺灣企業創造的。投資計劃是位於廈門的出口業的基本部分。1993年，臺灣企業家在廈門經濟特區投資了300百萬美元，設立了200個生產廠家。因此，“臺灣”企業在該年廈門的總出口中佔22,7%。⁵⁹

可以預測的是，大陸與臺灣之間的三通全部執行後，經濟特區和臺灣之間的投資與貿易可能會出現巨大的增長。臺灣某些著名的政治人物，例如民進黨主席謝長廷預測說，祇要北京和臺灣同時被接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⁶⁰，臺灣政府將與大陸建立直接聯繫。入世受到北京的拖延，因為它需要為它的農業進行準備，同時，按照國際標準更新有關法律。

57.《今日澳門》，2001年4月17日。

58.《今日澳門》，2001年3月8日。

59. 齊羅 (Qi Luo) 和侯威 (Christopher Howe)《中國季刊》，1993年12月，第757頁。

60.《印度時報》電子版，2001年2月20日主頁。

1998年，臺灣與廣東省的貿易關係及在廣東的投資有所減退，這肯定是地區經濟危機的結果。因此，該年廣東向臺灣的出口額為224百萬美元，比前一年降低28.2%，而同期進口的臺灣貨達到1,069百萬美元，比前一年降低2.6%。在投資方面來說，廣東省是最吸引臺灣企業者的省份之一，因此，臺灣的投資在深圳和汕頭的外國投資中佔30%以上。⁶¹ 臺灣在珠海經濟特區的投資也非常大，因此臺灣企業家在珠海特區的投資高於400百萬美金。⁶²

至於海南經濟特區，在這中國第二大島嶼上，目前有1,200多個臺灣企業在運作，其投資總額達到130億美元。海南每年約接待15萬臺灣遊客。2000年，將近一百個臺灣企業參加了一個為期一周的企業家會議。在此會議上，來訪者考察了海南島的投資環境，討論了經濟、貿易合作深化的問題。這次會議是私人企業之間的第一次碰頭，其目的是探討臺灣和中國之間經濟貿易及文化交流的問題。舉辦的目的在於推進海峽兩岸，尤其是海南與臺灣這兩個中國最大島嶼之間的合作關係。⁶³

結 論

對外開放，以一國兩制原則為基礎的民族統一政策，以及設立對外國直接投資開放的地區的互補性可以用來從區域經濟一體化及正在進行的政治統一的角度分析大中華的概念。

20世紀70年代末，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內的掌權派非常務實地接受了國家經濟開放的必要性，利用地理、歷史及文化的相同性來促進同一自然經濟區不同部分的接近，同時喚醒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開放。在此意義上，區域一體化過程得益於毛澤東後時代的領袖們所採取的一系列經濟改革的政策。這些經濟改革決定了在廣東及福建省設立經濟特區。上述特區位於可以獲得外國直接投資及在外國或非共產黨統治下中華文明地區的附近。

61. 廣東國際網絡新聞中心主頁。

62. 全球在線資源，參見<http://www.globalsources.com>。

63. 《人民日報》英語電子版，<http://www.peopledaily.com.cn/english/>。

在深圳及珠海經濟特區的情況下，它們與香港及澳門正對。香港及澳門這兩個地區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與中國中央的共產黨制度有所不同。經濟特區的設立為香港及澳門的大規模投資提供了可能性。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臺灣也加入了這一投資運動。經濟特區的設立為減緩經濟方面的制度差異作出了貢獻。

的確，經濟特區是在共產黨中國轉載入市場經濟的名副其實的實驗室。然而從1978年至1992年，中國共產黨內的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的權利平衡的遊戲阻止了正式承認經濟特區設立得經驗是中國其他經濟地區改革的決定性榜樣。而1992年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里程碑。

在1992年10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主要目標的方針。這一官方的立場前曲是鄧小平於1992年2月對經濟特區所進行的歷史性訪問。這位中國領導人強調說，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本身並不是區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準。⁶⁴因此，建立一個“社會市場經濟”取得了巨大的重要性，因為不論其屬於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引進了新的企業的管理機制，對外資開放，引進外國技術等等。根據江澤民在第十四次黨大會政治報告，將主要資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⁶⁵

共產黨內部改革派立場的聲明導致了香港、臺灣、澳門及華南省份，主要是經濟特區之間的貿易及投資額的增加。

目前，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中心地帶是珠江三角洲。而它又以香港城市地區為主要推動力。某些地區分析家也將深圳列入香港城市地區中。的確，香港—深圳，澳門—珠海這兩個地區為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以及整個華南地區的持續的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臺灣的發展一開始基於同美國的關係，目前如果不將它的密集型勞動的企業遷往中國大陸，它已無法進行其經濟結構的重建。珠江三角洲對臺灣這一過程而言是主要的。

64.《人民日報》英語電子版，1992年10月24日。

65.《政治報告（1992年）》：“加快改革，開放，建設現代化，建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參見《人民日報》1992年10月24日。

至於國家統一政策的施行，1997年和1999年所設立的香港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對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統一中國是歷史性的進展。的確，於1984年和1987年分別通過的中英、中葡聯合聲明是仍然有效的國際條約。它確定了香港及澳門回歸的模式，保證保留港澳各自的經濟、社會及政治制度的特性。這些特性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標誌，它是經濟成功的主要因素。保留它意味著對特別行政區為中國經濟現代化作出的貢獻加以保護，同時意味著進一步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良好投資環境。

同時，臺灣同中國大陸統一的展望有了更大的支援，因為香港和澳門可以為海峽兩岸關係的深化從中穿針引線，而雙方不必作出最後的承諾。無論如何，在特別行政區內實施第二種制度的成功，保留它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特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分清楚的與臺灣接近的因素。

總而言之，華南經濟亞地區所面臨的是在不同華人政府中下的不同政治結構，以大中華概念為核心的經濟結構的一體化傾向。

書目

1. 科里斯蒂那阿爾維斯 (Cristina Alves) 《珠江三角洲的地緣政治與地理連貫》載《珠江三角洲中的澳門》，東方學院，社會及政治科學系，里斯本科技大學，2000年。
2. 蒙得哈 (Reuben Mondejar) 《未來於今始。1997年的香港與中國》香港理工大學。
3. 科魯格 (R. N. Clough) 《試圖穿越臺灣海峽：民間外交》，Westview, Boulder 出版社，1993年。
4. 科索樂 (Narana Coissoro) 《珠江三角洲中的澳門》，東方學院，社會及政治科學系，里斯本科技大學，2000年。
5. 庫科 (Ian G. Cook)，多爾 (Marcus A. Doel) 及李 (Rex Li) 《被分割的亞洲：亞太的區域性一體化與國家的解體》，太平洋興起研究系列，Ashgate 出版社。
6. 王 (C.F. Wang, James) 《當代中國政治：介紹》，1997年，第6版，第8章：《大華南，香港和澳門及珠江三角洲的轉向》，第189-190頁。
7. 休斯 (Christopher Hughes) 《臺灣和中國民族主義 - 國家認同與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倫敦，Routledge 出版社，1997年。
8. 阿什 (F. Ash, Robert)，奎 (.Y. Y. Kueh) 《大中國之內的經濟一體化：中國，香港及臺灣之間貿易和投資流動》載《大中國：下個超級大國？》，桑巴格 (David Shambaugh) 編，《中國季刊》，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
9. (蒙得哈 (Reuben Mondejar) 《未來於今始。1997年的香港與中國》香港理工大學。
10. 哈梅 (Ohmae, Kenichi) 《囊擴性的全球經濟：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的意義》。劍橋，馬薩諸塞，哈佛貿易雜誌叢書，1997年。
11. 羅馬那 (Romana, Heitor)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文化因素的幾個問題》載《社會科學》雜誌單行本，1989年，社會及政治科學系1995年。
12. 《大中國：下個超級大國？》，桑巴格 (David Shambaugh) 編，《中國季刊》，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
13. 諾爾 (Tracy, Noel) 《東南部：中國區域經濟中中國經濟改革的先鋒：奔向2020年？》，林格 (Godfrey Linge) 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牛津、紐約，1997年。

14. 威廉 (Van Kemenade, Willem) 《中國、香港、臺灣》，INC. ,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6年。
15. Yue-man Yeung《全球化與網絡社會：亞太的都市區域性變化》，夏威夷大學出版社，2000年。
16. Xiangming Chen《中國的綜合增長與亞太的經濟》，載《這是在外緣？：對太平洋地區想法的評論透視》，蒂爾利科 (Arif Dirlik) 編，1997年。

報刊

1. 《亞洲經濟學報》，2000年，第14卷，第1期 (Yanrui Wu《華南地區的生產力，成長和經濟一體化》)；
2. 《中國季刊》，第136期，1993年12月 (桑巴格 (David Shambaugh)《引言：大中國的出現》)；
3. 《澳門論壇報》，2001年3月13日、15日；
4. 《今日澳門》，2001年1月22日，2001年2月8日，2001年3月8日、13日；
5. 《澳門聚焦》，《澳門和珠江三角洲》，第1卷，第2期，2000年7月；
6. 《太平洋興起報告》，第5期，1997年7月，舊金山大學 (烏勒 (Stephen Uhalley Jr)《香港和大中華》)；
7. 《人民日報》，1992年10月24日；
8. 《行政雜誌》，19 / 20期，1993年4月第6卷；
9. 《世界報》，2000年5月10日；

英特網

1. <http://www.mac.gov.tw.com>
2. <http://www.tdctrade.com>
3. <http://www.globalsources.com>
4. <http://www.ipim.gov.mo.com>
5. <http://www.peopledaily.com>
6. <http://www.taipei.org.com>
7. <http://www.hongkong97.comhk/newera/life/qualityoflife/Article1997.html>

8. <http://www.pacificrim.usfca.edu/research/pacrimreport/pacrimreport5.html>
9. <http://www.usis.usemb.se/ERT/e06/9HONGKOHTML>(蒙得哈 (Reuben Mondejar) 《未來於今始。1997年的香港與中國》，香港理工大學)
10. http://www.toda.org/conferences/hugg_hon/hugg_hon_papers/j_camilleri.html (卡米勒爾 (Josepf A. Camilleri) 《亞太的區域主義與全球主義：經濟，安全和政治的相互作用》，La Trobe 大學，墨爾本)